

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黄正元,贾娟,陶佳玲

(湖南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株洲 412007)

[摘要]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问题的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贯穿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各个不同时期,综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每一个理论成果都源于中国共产党对一定时期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准确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正是源于中国共产党对于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精准把握。

[关键词]社会主要矛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时代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18)04-0069-05

Transformation of the Principal Contradictions in Chinese Society and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HUANG Zhengyuan, JIA Juan, TAO Jialing

(College of Marxism,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Hunan 412007, China)

**Abstrac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has combined Marxist theory with China's specific reality and has formed the theoretical achievements of Marxism to solve the problems in China.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runs through the different period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led by the CPC. Looking at the course of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every theoretical achievement in the process of it originates from the CPC's accurate grasp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principal contradictions of Chinese society in a certain period of time. The theor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is exactly based on the CPC's accurate grasp of the principal contradictions of the Chinese society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principal social contradictions;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new era

准确把握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及其转化并以此为依据做出判断而不是照搬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走向一个又一个胜利的关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sup>[1]</sup>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党的十九大)报告

中的这一重大论断,是中国共产党精准把握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问题的重要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伟大创新。

一 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主要矛盾的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实践

衡量一个理论的生命力有两个维度,即时间维

收稿日期: 2018-04-18

作者简介: 黄正元(1965-),男,湖南邵阳人,湖南工业大学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社会认识论;

贾娟(1988-),女,河南平顶山人,湖南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陶佳玲(1994-),女,湖南洞口人,湖南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度与空间维度。时间维度,是指一个理论必须与时代合拍,反映时代精神;落后于时代的理论,就只能进入古物陈列馆,同纺车和青铜斧一样去展现自身的价值。空间维度,是指一个理论必须寓于实践之中,帮助解决实践中的问题。理论本身只是一个逻辑体系,是“本本”,这个“本本”从实践中来;但是,这个从实践中来的“本本”,只有回到实践中去,让理论的两个维度在人的主观能动实践中发生交汇,才能实现理论的合目的性功能。实践中的问题纷繁复杂,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影响全局性、战略性、关键性的问题就是社会的主要矛盾。

马克思、恩格斯在深入剖析了不同社会形态下社会矛盾运动复杂情形的基础上指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构成社会的基本矛盾。在社会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社会基本矛盾体现出与各个不同阶段相适应的特殊形式,这个阶段的主要矛盾决定了该阶段社会的性质。马克思形象地将它表述为:“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sup>[2]</sup>在各个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人们作出的判断就会不同,因为人们总离不开那个时期的社会生产力状况,其制定的战略方针和政策总是会全部或部分地反映当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现实状况。

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由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由闭关自守走向改革开放、由经济独立发展走向经济全球化,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实现了一个又一个的阶段性的飞跃。从马克思主义矛盾理论的视角来看,每个阶段性的飞跃都是该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集中突破。

社会发展的每个阶段呈现出来的不同于其他阶段的特点,都是由该阶段的主要矛盾及其运动的特殊形式决定的。任何一个执政党,要领导国家与社会的发展走向成功,必须抓住社会的主要矛盾,并以主要矛盾的变化作为确定社会发展阶段性主要任务的依据。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指导思想,抓住了社会发展各阶段的主要矛盾,并以此为依据制定出了正确的方针政策,才在中国革命与建设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成功。

在新的历史时期,社会转型与人们的价值观念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这使社会矛盾显得更为复杂。如何抓住主要矛盾,成为考验新时期如何正确

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解决中国具体问题的试金石。中国共产党在各个不同时期取得的主要成就,究其原因,就是善于把握时局,善于抓住主要矛盾。

毛泽东的《矛盾论》就是基于准确把握当时中国革命情况、并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经典著作。当时中国革命所面临的矛盾很复杂,毛泽东深入了解了当时的实际情况,结合他当时反复研究的经典著作《反杜林论》《唯物论和经验批判主义》《谈谈辩证法问题》等,唯物而辩证地分析了当时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从而找到了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矛盾有主次之分,有缓急之别,因此,毛泽东指出:“抓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sup>[3]</sup>毛泽东还指出:“对于矛盾的各种不平衡情况的研究,对于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研究,成为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一切共产党人都应当注意的。”<sup>[3]326</sup>在阶级社会里,社会主要矛盾突出表现为阶级矛盾;在阶级矛盾不再是社会主要矛盾之后,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物质与文化生活水平就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sup>[3]311</sup>面对中国革命所处的现实状况,毛泽东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用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大众和封建制度的矛盾,用民主革命的方法去解决;殖民地和帝国主义的矛盾,用民族革命战争的方法去解决;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用农业集体化和农业机械化的方法去解决;共产党内的矛盾,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社会和自然的矛盾,用发展生产力的方法去解决。”<sup>[3]311</sup>矛盾的特殊的质决定矛盾的解决方法,用毛泽东的话语来表达,那就是:“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遵守的一个原则。”<sup>[3]311</sup>社会矛盾的质,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有着各自的特点。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皆有各自特殊的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正是正确分析并把握了中国社会不同时期的主要矛盾,并以此为根据实事求是地制定出了各个时期的方针政策,因而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与建设的成就。在此期间,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经典著作,无一不是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创

新性成果。

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个表述,不仅仅是几个字符的变化,不仅仅是一两个用语的转换,而是表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

我国经过近 40 年来的改革开放,14 亿人口的温饱问题已经基本解决,总体上已经实现了小康,正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大道上。我国社会的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已经进入世界前列,全国人民不仅对物质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对精神生活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要求,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环境污染严重、生态保护观念亟待加强等现实情形极不相称。这种不相称,已经成为我国社会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基于对此国情的深刻认识,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对于这个主要矛盾的认识与把握,不仅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思想之一,而且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精准把握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创新的正相一致性。

## 二 历史上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

对于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如何进行革命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根本就没有现成的答案,世界上也没有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如何进行革命的现成经验可资借鉴。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只有依靠自己对中国实际情况的把握程度寻找解决问题的出路。为此,中国共产党人在接受共产国际帮助的同时展开了艰辛的探索。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强调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以解除内外压迫”<sup>[4]</sup>的方针政策,正好因应于这个时代背景。后来,由于蒋介石叛变导致大革命失败,中国共产党在 1927 年的“八七会议”上,制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作出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走以农村为重点由农村发展进而包围城市的道路的决定。这条道路,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城市包围农村”的道路貌似背道而驰,实则是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的、适合中国国情的革

命道路。中国革命正是沿着这条道路,走向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随着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中华民族反抗外敌侵略的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之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及时而准确地抓住当时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提出“抗击日本侵略已经成为中国人民的主要目标”。在《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中,毛泽东指出:“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决不能坐视中华民族的沦亡于日本帝国主义……同全中国一切武装队伍联合起来共同抗日。”<sup>[5]</sup>当联合一切力量抗日成为当时中国的主要矛盾时,在 1935 年的《八一宣言》中就不再提“打倒国民党政府和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表述了,而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倡议。1937 年 5 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文中明确指出:“由于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矛盾时,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而产生的国际关系和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形成了目前形势的新的发展阶段。”<sup>[3]252</sup>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提出来的。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根据时局的变化,毛泽东指出:“从整个形势看来,抗日战争的阶段过去了,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斗争。”<sup>[6]</sup>1946 年 6 月,全面内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因应时局的变化,及时提出了建立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的对策。

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之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变成如何恢复生产、发展经济的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适时提出了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政策,直到 1956 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如何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的情形下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变成了中国共产党面对的主要矛盾。基于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党的八大)报告中提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sup>[7]</sup>正是由于正确判断了当时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党的八大及时应变,领导中国人民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又迈出了新的步伐。

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针对利益分配问题,

出现了矛盾与分歧,1957年2月毛泽东及时地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sup>[8]</sup>后续的一系列事件,也充分证明,当抓住了主要矛盾时,社会的发展就顺利;当偏离或误判了主要矛盾时,社会发展就会遭受挫折。

当一个政党对社会矛盾认识出现偏差或误判时,就会形成错误的政策,社会发展就会被引向错误的方向。“文化大革命”就是一个沉痛的教训。源于对当时阶级矛盾形势的错误判断,形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路线,最终导致长达十年的历史浩劫。

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经历并反思“文化大革命”给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带来的巨大损失之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同时分析当时的世界形势——在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中国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美苏两极格局逐渐形成均势,和平发展成为世界主题。基于这个判断,邓小平作出了“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sup>[9]</sup>重要论断,并及时提出必须抓住这个机遇,“用全力来发展经济”<sup>[10]</sup>。由此,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简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回顾历史,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决策对于后来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起到了历史性的作用,使得中国社会走上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轨道。

这个历史性转折,主要是缘于当时以邓小平为首的党中央抓住了当时中国社会生产力严重落后的国情,抓住了“社会主义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这个主要矛盾。在当时“左”的错误倾向比较严重的背景下,承认当时生产力远不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要把经济建设作为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提出来,这是需要超人胆识与勇气的。事实证明,这种勇气,是建立在对中国国情的深刻洞悉与精准把握基础之上的。实践还证明,这个历史性转折,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结束了长期以来的姓资姓社的争论,从根本上实现了党的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迎来了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力快速发展且直至今今天仍然发展态势良

好的景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社会主要矛盾出现了变化,这个变化很快被党中央掌握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sup>[11]</sup>,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和实行改革开放以后的社会主要矛盾。

实践证明,当中国共产党准确把握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并及时作出应对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就进行顺利;反之,中国社会的社会主义事业就会遭遇曲折。

### 三 新时期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矛盾理论分析和解决中国共产党和我国发展中的重大问题,通过艰辛的理论探索,取得了重大的理论创新成果,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sup>[12]</sup>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经过近40年的改革开放,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深刻变化。主要表现在:其一,社会生产力方面发生了实质性改变,“落后的社会生产”之论断已经不符合中国国情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国防实力、综合国力已经得到了大幅提高,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一工业大国和第一贸易大国,并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高科技方面如天宫、蛟龙、天眼、悟空、墨子、大飞机等重大科技成果相继问世。因此,“落后的社会生产”的判断已经不符合中国社会当前的现实实际。其二,中国社会的发展定位已经不再是“满足人民最基本的物质需要与文化需要”,而是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多方面的改革开放措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为满足人民多方面的需要提供了可能。人民对物质文明的需要由原来的“基本满足”已经向更高档、更优质、更快捷、更舒适、更丰富、更精致、更可靠、更有保障方面转变。同时,人民对制度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等方面也提出了要求。基于中国人民需求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变化的大背景,党的十九大作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判断。其三,“社会生产严重不足、生产力普遍落后”的情况也发生了巨大转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百废待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抓革命促生产”的主调变成

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近40年的改革开放使得生产方面的主要矛盾不再是落后的社会生产力,而是转化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了。生活方面的主要矛盾不再是“满足基本需要”,而是转变为“满足美好生活需求”了。发展中的“不平衡”问题,包括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等各方面发展不够平衡。很显然,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充分,是现阶段我国社会各种矛盾中的主要矛盾,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我们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sup>[13]</sup>

综观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社会发展方针政策形成及转变的情形,可以看出,当中国共产党准确把握当时社会主要矛盾和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并以此为依据制定出来的战略方针就正确,社会就会顺利发展;反之,我国社会发展的战略就失误,社会发展就停滞甚至倒退。中国革命与建设发展历程中的重大事件,无一不证明了中国共产对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及其转化的每一次准确把握正好也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次次提升。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正是这样的一个伟大理论创新。<sup>[14]</sup>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

大会上的报告[N]. 人民日报, 2017-10-19(01).

[2]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142.

[3]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322.

[4] 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146.

[5] 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324-325.

[6]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1130.

[7]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编写组.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6:82.

[8] 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第7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214.

[9]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127.

[10] 冷溶,汪作玲.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1085.

[11] 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8.

[12] 李才元. 论习近平经济思想及其历史贡献[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3(1):8-13.

[13] 习近平,刘云山,王岐山,等. 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7:10.

[14] 艾四林,康沛竹. 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理论与实践逻辑[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8(1):13-18.

责任编辑:蔡燕飞